

苦命鶯

(本文插圖刊第2、57、58頁)

梁思成與林徽因

水（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梁思成是專家學者，更是名父之子（

父親梁啟超）。林徽因是才女，是佳人，也是名父之女（父親林長民），才子佳人，才女配才郎真是絕配，不幸時運不濟，婚後不久，任教關外、九一八事變前夕，被迫離開東北，其後抗戰爆發，梁思成與林徽因攜帶家小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到長沙，歷盡千辛萬苦，轉往昆明，流亡飄泊在西南天地間，抗戰勝利，回到北平，不久大陸變色，梁思成夫婦的遭遇更為悲慘，真是一對苦命鶯。

……
中重病，獲准回鄉。
一九〇一年，這對流亡夫婦生下了次子梁思成，因長子早夭，思成實際上是五兄弟中最長者。他還有姐妹四人。他們當時住在神戶郊區的須磨，這裏景色如畫，既有海濱，又有松濤，這位富于雅興的文人，爲自己的住處取名「雙濤園」。思成從小就酷愛運動，童年經常到海濱游泳，到松林玩耍，學會爬樹。後來在初戀時第一次約女友去太廟玩，一時興起，拋下女友不管，竟然爬上樹去。幾十年後，夫人還提起這件趣事。這位梁教授倒風趣地說：誰叫你還愛上這個不近人情的小夥子。

思成每天由住地坐火車去上華僑子弟學校，在日本度過了童年，直到十歲隨全家返回祖國。

在天津住了半年，後遷居北京，住在北海一帶。

鴛鴦命苦

家學淵源多采才華

清末變法維新運動失敗，梁啟超攜妻李氏流亡日本。李氏貴州人，清朝禮部尚書李端棻之妹，他在一次科舉考試中看中梁啟超的文才，因而把愛妹許配給梁啟超。因戊戌政變李梁之間的親屬關係，李端棻受牽連，被發配新疆，所幸因途

這裏是北京城最美的地區，也是中國古建築藝術薈萃之地，這一切陶冶了這位才華出衆的少年，在中國古建在他心靈深處扎下很深的根。回到北京後，他就讀匯文中學。十五歲時便進入「清華學堂中等科」學習，接受「中西文化薈萃一堂」的教育（當時清華學堂分中等科、高等科，學制各

四年），據他的同窗摯友陳植回憶：「梁思成性格爽直，精力充沛，風趣幽默，在清華八年中，他顯示出多方面的才華，善于鋼筆畫，構思簡潔，用筆或勁練或瀟灑，曾在一九二三—一二三年清華年報任美術編輯；酷愛音樂，與其弟思永及黃自等四五人向張靄貞女士學鋼琴，他還向菲律賓人范魯索（Veloso）學小提琴。一九一八年，清華成立管樂隊，由荷蘭人海門斯（Hymens）任指揮，一九一九年思成任隊長。他吹第一小號，亦擅長短笛。」他所在的班叫一九二三級，也叫癸亥級。同窗學習的有陳植、顧毓琇、梁實秋、施嘉煥、孫立人、王化成、吳文藻、吳景超等。他們都是級內的佼佼者。梁思成除課業優秀外，業餘愛好十分廣泛。體育出衆，曾在全校運動會上獲跳高第一名。他的「特異技能」是爬高，能在鐵架下手攀繩索自由上下，爲同伴們所不及。

這些功夫爲他在三十年代，跋山涉水，到各地考察古建築，常常「身先士卒」，攀上古建築的頂端，進行測繪和拍攝打下基礎。在諸多業餘愛好中，他最得意的是美術。他的美術才能深得美術教師的賞識，被列爲全校少數最有才能的小美

術家之一。曾被美術教師指定和楊廷寶、聞一多等一起組織一個研究美術及其與人生關係的團體——「繆斯」。

學生時代的梁思成還具有冷靜而敏捷的政治頭腦，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中，他是清華學生中的小領袖之一，是「愛國十八團」和「義勇軍」中的中堅分子。被同學們稱為「一個有政治頭腦的藝術家」。

他家學淵源，師承其父梁啟超和康有為，根基扎实，具有深厚的文化修養，是同窗所不及的。

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正當他行將出國留學之際，他和弟弟思永同乘一輛摩托車去參加北京學生舉行的「國恥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是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賣國「二十一條」的日子）紀念活動，行至南池子出口處，被北洋軍閥的陸軍次長金永炎的汽車特勢橫過馬路撞翻，梁思成的左腿骨折。出洋時間不得不延遲。一年以後，即一九二四年六月，梁思成抵美。

同時醉心建築藝術

一九一八年，梁思成十七歲，風華正茂，認識了林徽因，時年十四歲。這位窈窕淑女，面容清秀，具有東方雕刻之美，雙眸明亮，神采煥發，談吐自如，才華橫溢，誰都會愛慕這位才女。

林徽因（原為音，後改因）原籍福建閩侯，一九〇四年出生浙江杭州。曾就讀於北京培華女子學院。徽因的父親林長民曾留學日本，善長書法，是梁啟超的世交，一九二〇年作為一名外交官出

使英國，考察憲法，帶着愛女徽因赴英求學。她在倫敦時的房東是一位建築師，這位女建築師非常喜歡這個聰穎秀麗的東方少女，熱情給她介紹建築藝術，教她繪畫、製圖、設計；徽因深受感染，愛上了建築學科，立下志願終身從事這項事業。她酷愛旅行，充分利用旅居國外的機會，四處遊覽，開擴眼界，增長見識，培養情操，啓迪智慧。她會自豪地說：「我常在旅遊中得到啓示，歐洲名流旅館我都去光臨過。」她開朗的性格，淵博的學識，敏銳的洞察力，也許正是她遊學海外的結果吧！

兩年後，父親要回國，她依戀着倫敦，想留下繼續學習，父親不放心一個十幾歲的女子單獨留在國外，她要求父親答應她以後一定給她學習建築的機會，否則就不肯回來。如果她當時不回國，生活的歷程又將如何安排呢？她回來了，回來得正是時候，這一對別了兩年的情人，見面後發現他們之間的意趣更相投了，他們愛詩、愛文學，愛繪畫、雕刻，尤其是建築藝術，像是一根紅線，終於把他們二人繫在一起，結為伉儷。

深入探究中國建築

一九二四年，梁思成與林徽因相約一同赴美攻讀建築學，他們來到費城賓州大學，梁如願以償，進了建築系二年級；因當時賓州大學不收女生，林進了美術學院，但她選修了建築系的許多課程，同時還在耶魯大學戲劇學院 G.B. 帕克教授工作室學習舞臺美術半年。他們學習建築史的時候，看到許多書籍上非常詳盡地記敍各國的古

建築，有埃及的、希臘的、羅馬的，唯獨中國的古建築被排除在歷史傳統範圍之外，有些書上對歐洲的古建築頌揚備至，而對中國建築大肆貶低。這一切激發起這兩位赤子的民族意識。

當時其父梁啟超及時寄給他們一本由朱啓鈴出資出刊的《宋營造法式》，這是一本介紹表現八百年前中國建築達到高度水準的著作，對他們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促使他們下定決心，回國研究中國的傳統建築。在美學習期間，同班同學還有楊廷寶、陳植、趙深等，他們這些中國留學生都是成績佼佼者。他們經常一起切磋，立志為中國建築事業獻出自己的「一生」，他們回國後都成為中國建築界的開拓者。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裏，還有旅美留學文、法諸多專業的留學生，金岳霖就是經常往來的座上客。他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知識領域的擴大，對日後的成就起了無形的作用。林徽因是一位性格開朗的女性，與一般東方女子不同，思想開放，交游甚廣，對朋友的情誼，無論男女都是真誠的，凡是與她接觸過的朋友都有同感。她對金岳霖的感情超越一般朋友，但這並未妨礙她與梁思成的愛情，梁也並不因她對金的深厚友情而吃醋，他們坦誠相待，成為一生最親密的朋友。金岳霖這位大哲學家，也許出於其他原因一輩子沒結婚。他是梁家的常客，學術上、思想上、感情上的交流一生從未間斷。梁教授會告誡學生：要他們經常聊天，他特別介紹金教授常來他家閒聊，在閒聊時無形中得到啓示。梁非常珍惜他們彼此間的情誼，難能可貴。

訪大姐梁令嫻，旅遊結婚，這對志同道合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們利用這次回國的機會，取道歐洲，實現考察歐洲古建築的宏願，為他們在三十年代考察中國古建築作好準備。

結合技術逆時而動

中國古有道器之分。木土營造，匠士之能，士大夫不屑爲，認爲雕蟲小技不登大雅之堂。清門培養建築設計的學科和學堂。這批旅美歸來的青年學者們，爲開拓中華的建築教育事業，他們來到瀋陽，創建我國最早的東北大學建築系，由梁思成主建築系。梁先生對教育事業非常熱心，克復初到東北的重重困難，親自制訂教學計劃，籌集圖書設備，多方奔走，聘請著名建築師和學者，陳植、童嚮、蔡方蔭等任教，林徽因也任教授。

二十年代國外建築學有兩派，主流派是法國的「美學派」(Beaux-art)，以學習建築構圖爲主，輕技術。這是古典派的代表。而後起的美國賓州大學的流派「藝術與技術綜合派」，是革新派，主張建築藝術與技術應當結合。梁先生在東北大學建築系所倡導的教學方向正是後者。儘

美的存在詩意感受

築，爲整理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作點事。

管梁先生對西方古典建築很感興趣，對五柱式建築也很熟習，但他看清了現代建築的方向不是純藝術，這與他在賓州大學學習有一定關係，對現代建築的先驅，二十年代美國著名建築師Goodhue和Paul-Cret 視爲偶像，倍加崇敬。梁先生講授西方建築史，要求學生掌握五柱式，但堅決

一九二九年紫江朱桂辛在北平創立中國營造學社，特聘請國內知名學者梁思成和劉士能（劉敦楨）教授入社，開拓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隨後單士元教授也入社工作。梁教授主持法式組，劉教授主持文獻組，單教授致力文獻搜集和古建技術工藝之事。相繼入社工作的還有劉致平、莫

他熱衷於實物調查，從實地觀察考證，把握中國古代建築的真諦，在他們所寫的《北平郊建築雜錄》中談到「北平四郊近三百年間建築物極多，偶爾郊游，觸目都是饒有意味的古建。……有的是煊赫的『名勝』，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羣的世界遊歷團的讚揚，有的偶

「教育，在家裏兒童可以提問和發表意見，但不許哭鬧撒嬌。他們爲了事業，不得不經常離開可愛的孩子，託孩子的外婆照看。這位慈祥的老人一直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爲他們料理家務，活到九十多歲高壽才去世。他們的成就應當也有這位老人的一份功勞。」

營造學社設在中山公園裏靠東邊的一排平房裏，環境幽靜，工作和諧，這批志同道合之士從實際調查入手，研究中國古建築，邊測繪、研究，邊考證、整理，對照有關法式、則例作比較、作論證，開拓中國古建築實測的道路。編輯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七卷，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積累一批珍貴的資料。

主張建築設計要打破五柱式的舊框框，要求學生放手大膽的從事新建築的創作。他與林先生經常利用晚上來教室為學生改圖，講授渲染技法，要求嚴格，對教學一絲不苟，學生們由衷的感激敬佩他們。

在東北工學院任教期間，梁、林二位還常利用教學之餘，帶領學生參觀瀋陽昭陵及故宮。暑假又率領學生到北平參觀北平故宮、頤和園、圓明園及北平的新建築。對中國古建築的興趣愈來愈大。他親眼看到，中國生活在劇烈的變化中趣變求

的著名專家。
營造學社設在中山公園裏靠東邊的一排平房裏，環境幽靜，工作和諧，這批志同道合之士從實際調查入手，研究中國古建築，邊測繪、研究，邊考證、整理，對照有關法式、則例作比較、作論證，開拓中國古建築實測的道路。編輯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七卷，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積累一批珍貴的資料。

爾愛詩人的憑吊或畫家的欣賞。這些美的存在，在建築審美者的眼裏，都能引起詩意的感受，在『詩意』和『畫意』之外，還使他感到一種『建築意』的愉快。這也許是個狂妄的想法——但是，什麼叫做『建築意』？……

天然的材料經人的聰明建造，再受時間的洗禮，成美術與歷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鑒賞者一種特殊的性靈的融合，神志的感觸。……無論那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頽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名勝消沉痕跡顯真

一九三七年他們興致勃勃地到山西五台山去尋找那曾在敦煌壁畫上見到的「佛光寺」。他們不辭辛苦，騎驃、坐貨車、爬山，趕走在荒山野嶺裏，終於找到這座完美的唐代古建築——「佛光寺」大殿。正為此驚喜不已時，傳來了蘆溝橋的炮聲。他們匆忙中趕回北平，不久，這座古城淪陷了。他們不願生活在侵略者的鐵蹄下，決心離開北方，到祖國的西南地區去開始新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八月底扶老攜幼領着全家離開了北平。在北平六年，正是他們精力旺盛、研究工作順利、生活安適的年月。他們住在總布胡同，位於北平中心區。這個家幾乎變成一個文化沙龍，來往的社會名流絡繹不絕。這位活躍在北京文化圈內被譽為「小姐」的林教授，雖然身患肺病，在交誼場上仍精力旺盛，十分健談，旁若無人，

連在座的名流沈從文、蕭乾、金岳霖、梁思成等人都插不上嘴。這位「小姐」學識淵博，思想敏捷，語言鋒利，善於評論，從不模棱兩可，好惡分明。她還經常參加朱光潛先生家舉行的「讀詩會」，談論精闢，很有見地，深得文壇讚賞。在她主編的一本《大公報小說選》題記中寫道：「撇開自己熟識的生活不寫，因而顯露出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真純」。她號召作家們應「更個性、更真誠地來刻畫這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人生，不拘泥於任何一個角度」。她對待自己寫作的態度是認真的，在她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給美國好友費正清夫人（威爾瑪）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確：「……每當一個作品純粹是我對生活的熱愛的產物時，我就會寫得最好。它必須是從我的心坎裏爆發出來的，不論是喜還是悲。必得是由於我迫切需要表現它才寫的，是我所發覺或熟知的，要麼是我經過思考才瞭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認真、誠懇地想把它傳達給旁人的。對我說來，《讀者》並不是『公衆』，而比戚友更能瞭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們很渴望聽我的訴說，並且在聽之後，會喜，會悲。」一位三十年代的中國女作家，雖有滿腔抱負，既要支持丈夫的事業，又要負起家庭的義務，思想上充滿矛盾和苦惱，她給威爾瑪的信中還述說：「每當我做些家務活兒時，我總覺得太可惜了，覺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為重要的人們。於是，我趕快幹完手邊的活兒，以便去同他們『談心』。倘若家務活兒老幹不完，並且一樁地不斷添新的，我就會煩躁起來。所以我一向

搞不好家務，因為我的心總一半在旁處，並且一路上在咒詛我幹着活兒——然而我又很喜歡幹這種家務，有時還幹得格外出色。反之，每當我在會上，談論精闢，很有見地，深得文壇讚賞。在她主編的一本《大公報小說選》題記中寫道：「撇開自己熟識的生活不寫，因而顯露出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真純」。她號召作家們應「更個性、更真誠地來刻畫這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人生，不拘泥於任何一個角度」。她對待自己寫作的態度是認真的，在她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給美國好友費正清夫人（威爾瑪）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確：「……每當一個作品純粹是我對生活的熱愛的產物時，我就會寫得最好。它必須是從我的心坎裏爆發出來的，不論是喜還是悲。必得是由於我迫切需要表現它才寫的，是我所發覺或熟知的，要麼是我經過思考才瞭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認真、誠懇地想把它傳達給旁人的。對我說來，《讀者》並不是『公衆』，而比戚友更能瞭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們很渴望聽我的訴說，並且在聽之後，會喜，會悲。」一位三十年代的中國女作家，雖有滿腔抱負，既要支持丈夫的事業，又要負起家庭的義務，思想上充滿矛盾和苦惱，她給威爾瑪的信中還述說：「每當我做些家務活兒時，我總覺得太可惜了，覺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為重要的人們。於是，我趕快幹完手邊的活兒，以便去同他們『談心』。倘若家務活兒老幹不完，並且一樁地不斷添新的，我就會煩躁起來。所以我一向

一九三七年九月，梁思成帶着五口之家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到達長沙，在火車站附近租了兩間房子住下，這是一棟灰磚樓房，房東住在樓下，後面有一個狹窄陰暗的天井，與北平住的種有丁香花的寬敞四合院，差別很大，他們開始學習燒飯洗衣的家務，心情愉快的迎接這種變化。

那時，清華和北大的教授們以及北方的一些名流都雲集在長沙，打算從這裏轉移到西南大後方，教授們準備到昆明去籌辦西南聯大。大家常到梁家來座談國內外形勢，晚間大家在一起同唱救亡歌曲，梁思成總是當「樂隊指揮」。不幸的日子又來臨了，十一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大批日機轟炸長沙。由於事先沒有警報，大家毫無準備，據梁思成在抗日戰爭後一次講課時開玩笑說：「當時把日機當成中國飛機，我還跑到陽台上去看，直到炸彈在我眼前落地開花，才

說：我倒頂快活，覺得我很明智，覺得我是在做了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只有當孩子們生病或減輕了體重時，我才難過起來，有時午夜捫心自問，又覺得對他們不公道。」

長途跋涉歌唱救亡

課了。」事後談起此次死裏逃生的情況，非常危險。他見到爆炸起火後才衝進房中抱起女兒，林徽因抱起兒子，扶着她母親跑下樓，這時門窗已震垮，到處是玻璃碎片。還未走出大門，第二批炸彈又落地，牆被震塌，林徽因抱着兒子一起被震下樓梯，居然沒有受傷！這時，房子開始坍塌，玻璃碎片落在他們身上。等他們跑到院中，第三批炸彈又呼嘯而來，一顆炸彈正落在他們跑着的巷子盡頭，很幸運沒有爆炸，真是死裏逃生。他們從碎玻璃碴裏刨出所剩衣物，無家可歸，幸得張奚若幫助，讓了一間房臨時安身。

炸後的長沙，社會動盪不安，他們決心前往昆明。梁思成是北方來的知識份子中第一個先去昆明的。同行沒有一個熟人，頗有孤單之感。他們坐上公共汽車，經常德、沅陵、新晃到貴州，入雲南，一路上山山水水，風光綺麗，大自然的新鮮空氣洗去了所遭受的驚駭，開初幾天倒也安逸，曉行夜宿，投奔小店，長途跋涉，連續坐車，疲勞可想而知，對長年伏案工作的知識份子是難於經受的。

早在北平時，梁思成常常背痛，醫生診斷患者有脊椎間軟組織硬化症，專為他設計了一副鋼架子，「穿」在襯衣裏以支撐脊骨。旅途的勞累加重了他的負擔，一家人全靠他支撐。他肩上擔子雖重，情緒倒樂觀，一路上還經常陪伴孩子玩，到河邊去「打水飄」，技術頂高，一次能打二十來瓢。但不幸的事又發生了，林徽因身體本來虛弱，經幾天長途跋涉，到晃縣時感染肺炎，高燒至四十度。當時肺炎是很可怕的

病，尚無良藥，小縣城又沒有醫院。病情危急，所幸吉人自有天相，同車有一位留學日本懂得中草藥的女醫生，給開了一個方子，煎了幾付中藥，服後便退了燒。為了早日到達目的地，不得已拖着虛弱的身子繼續上路；雲貴多高山峻嶺，地勢險，有一次，車行至大山頂上，因十二月天氣太冷，車行不動了，天色已晚，大病初愈的林小姐快凍僵了。聽說這一帶常有土匪搶車，車上乘客驚恐萬狀；經檢修發現油已用光，乘客們只好一同推車慢慢走；突然有一個村莊奇迹般地出現在路旁，使這批乘客免於露宿荒野。

在離開長沙整整四十天後，他們終於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平安到達昆明。但不久，梁思成由於旅途勞累太過，北方人不適應南方水土，潮濕的氣候，使他患上很重的關節炎，脊椎病惡化，背痛難忍，一年時間都不能平臥，只好日夜半坐在一張帆布軟椅上。稍好，便找些事做，用不同深淺的線織被子，針腳勻淨，竟像是一件件藝術品。

在他生病時，美國一些大學和博物館寫信來邀請他到美國訪問講學，勸他利用這個機會到美國去治病。但是，他一一謝絕，不願在民族危急存亡的關頭離開自己的國家。他認為自己應該同全國人民一起堅持抗戰到底。

西陲恢復營造學社

在他們到達昆明後，劉敦楨一家以及營造學社其他一些成員也陸續到達。一九三九年春，營造學社在龍泉鎮的麥地村恢復了正常工作。學社

的辦公室設在一個舊尼姑庵裏，工作人員的家也在庵堂內，半泥土地鋪面，只好撒些石灰防潮。他們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繼續古建築的實地考察，測繪研究，涉足滇極偏僻的地區，許多有價值的中國古建築——大理的三塔、麗江的民居、四川的漢闕、石墓等，都是這時調研的成果。

可以「清燉」嗎？他自己的體質明顯地下降，雖然才四十多歲，背已經駝得很厲害，頭已重得擡不起來了，畫圖時用個小花瓶來「支撐」自己的下巴。堅忍的毅力令人敬佩。

更大的打擊來自天津漲大水的消息，營造學

社多年搜集的一批珍貴資料，因無法帶到後方，當時寄存在天津一家銀行的地窖中，被洪水淹毀，他們多年心血的積累，付諸東流。聞訊後怎叫他們不痛哭失聲。

儘管貧病交加，挫折接踵而至，但他們並不悲觀氣餒，常引讀杜甫的詩句「劍外忽傳收蜀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以自慰，深信收復失地的日子即將到來，他們夢想勝利後到全國各地再去考察。梁甚至說，如果他今生有機會去敦煌一次，他就是「一步一磕頭」也甘心情願。不幸這個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正當他們困窘在上塘村的日子裏，老朋友費正清遠道來探訪他們，給他們很大安慰。費氏深有所感，在他的《五十年回憶錄》中寫有一段描繪抗戰期間他去李莊探訪思成和徽因的情況。

「徽因瘦極了，但依舊那麼充滿活力，並且在操持着家務，因為什麼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飯菜一樣樣端上，然後我們就聊起來。主要是聽徽因一個人談……」費正清感嘆道：

「住了一個星期，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患重感冒，只好躺在床上。我深深被我這兩位朋友的堅毅精神所感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仍繼續作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

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却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日本古都視作恩人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梁先生不僅對中國古代建築文化的保護所起作用和貢獻是人人皆知的，日本人也感謝梁思成為「日本古都之恩人」。他對保護日本古都奈良免於轟炸所起的作用幾乎連他自己也忘却了。早在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本土遭到美機的廣泛慘重的轟炸，唯獨古都奈良幸免於難，不知何故。有人傳說是美軍中的學者所起的作用。但始終沒有搞清楚，是那位仁人的「保護建議」。前不久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宿白訪問日本時，日本管谷查問此事，宿白說可能是梁思成的建議，這件事並沒有得到證實。直到近年，羅哲文應邀參加在日本召開的一次保護文物古蹟的國際學術會議，會上管谷得知羅哲文是梁思成的早期弟子，抗戰期間在中國營造學社和梁思成一起，便問及這件事，希望能得到證實。羅哲文才追憶起當時的一些情況。羅說：「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一個夏天，思成老師告訴我，要我隨他去重慶，幫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慶，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樓裏，每天要在軍用地圖上按他用鉛筆繪出的符號用墨水正規描繪。當時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內容，但大體知道是日本佔領區的地圖和日本本土的地圖，標的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其中就有京都和奈良。」日本雖是戰爭敵國，但為了維

護世界的文化遺產，梁先生受美軍之託，做了一件保護人類文化的好事，使日本奈良和京都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幸免於難，大量文物古蹟得以保存，日本朝野均以「古都恩人」之稱來讚譽梁思成。

獲美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到處洋溢着勝利喜悅，還鄉日子終於盼到了。但他已走向衰老，夫人微因病魔纏身，八年的苦難，她的身體很難恢復了。醫生悄悄告訴他，夫人將不會很久於人世。這個難於承受的打擊和隱痛，只能深深藏在心底。他們不知不覺已到中年。

正清的一封信裏感慨萬分：

「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摧殘，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閑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麼樣，我可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却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

一直在盼望着它的到來）。我在疾病中就這麼焦灼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林微因是一位重情誼的女性，朋友們的友情安撫着這顆悲憤的心。她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從昆明寫給威爾瑪的信裏說：

「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裏是爲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爲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想和我的老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爲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後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在李莊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瞭解到處於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加深了我們久別後相互之間的瞭解。沒用多少時間，彼此之間的感情就重建起來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情操和思想。也暢敍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各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後方個人和社會的狀況。儘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着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這位非凡的女性，靠着這股感情的暖流以及欣慰，支撐她那虛弱的身軀。

一九四六年夏，梁思成教授接受清華大學聘

請，創辦建築系，任系主任。他帶着全家，與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同乘一架軍用機，由重慶直飛古都北平。他們總算回到了離別九年的故里。

這年秋天，梁思成教授應美國耶魯大學等一些學校的邀請，赴美講學一年，並作爲建築師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大廈的設計工作。趁機訪問他

的老朋友費正清教授和夫人費慰梅女士。這次在美國講學，將十餘年他所研究的中國古代建築藝術介紹給美國，離美時，把他講學所用《圖象中國建築史》（英文）的繪圖原稿交費慰梅女士暫時保存，準備日後配齊文稿在美國出版。這份文稿，幾經周折，終於一九八四年在美國首次出版。

在美國講學期間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所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

愛妻一再搏戰病魔

他滿懷着喜悅於一九四七年夏回國，不幸愛妻病情又惡化，結核已轉入腎臟，不得不作一次腎切除手術。雖然這位林教授重病纏身，却滿腔熱情地接待朋友，蕭乾回憶一九四七年他去探望林小姐的情況：「事先她寫信來說，一定得留一個整天給她。於是，我去清華園探望她了。」

「當年清華園管總務的可真細心，真愛護讀書人。老遠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豎了塊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寫的是：這裏住着一位病人，遵

的什麼，在劍橋學的什麼，在西歐戰場上的經歷，她都一一問到了。而她也把別後八年他們一家人的經歷，不厭其煩地講給我聽。」

浩劫來臨憂心忡忡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物價開始猛漲，民不聊生，教授的生活也變得很難過。清華園一片烏雲彌漫，穿黑樹子的打手曾闖入梁家抓「共產黨」，當時梁家並沒有一個「共產黨」。人人都感到中國快要大變了。大家在默默地等待着這一巨大變革的到來。

此刻，梁、林二先生憂慮重重，成千上萬的大炮正對準着北京城，炮火不留情，幾百年的古都，人類文化史上的「光輝成就」將毀於一旦。

這年冬天，共軍的幹部來到梁家，請梁先生在軍用地上標出北京城的文化古蹟，以防攻城時候毀掉。梁先生驚愕、欣喜之情難以言喻。於是義不容辭，親自帶領幾位青年教師按照他多年考察實例取得的資料，對照有關文獻，夜以繼日的工作，在遠遠的炮聲回響中，整理編制了第一份《全國建築文物簡目》。條目下附有詳細所在地點、文物性質、建造或重修年代，以及特殊意義和價值等。在說明中特別指出：「本簡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時保護文物之用。」

這件事其實並非偶然。梁先生早在抗日戰爭後期，曾編過一份全國文物古蹟名單，託人送了

一份給周恩來，想他必還記得梁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後聽說，請梁先生標圖的事確是周的指示。

挖肉剝皮一樣傷痛

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不久梁先生的欣喜却又化成了憂慮，當初共軍曾經準備付出血的代價來保護的古蹟，似乎變得不很值得珍惜了。繼三座門（在天安門前長安街上）被拆除之後，北京古城牆又遭到拆除，林先生也嘆息地說，北京古城被拆使她太傷心了！梁先生終於說出了一個熱愛祖國文化的學者「無比痛苦」的話：「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的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這位提倡科學地保護文物建築的先驅，雖道出了內心的隱痛，却無能為力。

在北平被圍期間，飛機還不時來清華園投彈轟炸，有一次梁先生開完臨時校務委員會從工字廳出來，正遇上飛機投彈，炸彈落在他身前不遠的小橋邊，險些遭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一些知識份子滿懷喜悅地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梁先生興高采烈地應邀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建國大計。這些飽受苦難的知識份子多麼希望全國上下同心協力，把新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獨立的人民的國家。

參與故都建設規劃

一九四九年春天，梁先生夫婦送走了心愛的大女兒去參加革命，他們自己也積極地為建設新中國忘我的工作。四十八歲的梁思成未老先衰，

他拖着帶病的身體和身患重病的夫人，抱着滿腔熱情投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設計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他們嘔心瀝血，與清華大學建築系一批青年教師完成了這一重要任務。由於他們

身體不好，設計室只好利用他家小客廳，一個不大的房間幾乎變成了「作坊」。

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如何建設，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項重要任務。

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請梁思成先生擔任首都規劃委員會副主任，負責領導北京市的規劃設計工作。

遠在抗戰時期，梁先生即已致力於城市建設問題的研究，尋找中國城市建設的道路。

梁先生非常熱愛北京城，他第一個提出要保護整個北京城。他寫道：「北平市之整個建築部署，無論由都市計劃、歷史或藝術的觀點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見的瑰寶。」「北平是現在世界上中古大都市之孤例。」

他爲了搞好這個不平凡的工作，特意由上海

請來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與他共同研究規劃北京

城的大事。陳先生多年在英國從事城市規劃的研究，一九四六年北平市政府特聘請他負責北平都市計劃工作，他滿懷熱情回國赴任。但當時的中央政府強留他在南京工作。解放前的三年歲月使他很絕望和痛苦，得知梁先生約他來京共商建設北京城的大事，他欣然帶了全家於當年十月來到北京。他們一見如故，苦樂與共，夜以繼日地進行規劃工作，很快提出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並聯名寫成了《對首都

建設的建議》一文，梁先生自費刊印，報送有關領導人審閱。他們提出的這個新方案，既可以達到保護北京歷史名城的目的，又與首都即將開始的大規模建設相銜接。但是，時隔不久，這二《建議》却被視爲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與「一面倒」方針「背道而馳」。最嚴重的指責是「梁陳方案」設計的新行政中心「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爲全國人民嚮往的政治中心。

當新方案備受指責時，梁陳二位先生赤子之心未消，繼續提出一個補充方案，研究以天安門爲中心的皇城周圍規劃，探討舊城區中心的改建的可能性。這一補充規劃方案的設想是以城內「三海」爲重點（這是世界各國首都中少有的寬闊水面和大片庭園綠地），其南面與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中軸線相連接，使歷代帝王的離宮與城市環境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由於當時正在批判「梁陳方案」，把學術觀點上升到政治，這個補充方案更無法提出了。

三十年過去了，回頭看看「梁陳方案」，確是一個科學的，深思熟慮的，繼往開來的，爲人民的利益，爲民族的文化，爲子孫後代長遠着想。所作出的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北京城的規劃設想。如果按照這個方案建設，北京城牆可以保護下來，許多文物古蹟不至於遭到拆除，現在北京城內的混亂交通狀況完全可以避免。這是多麼大的損失啊！

大帽子扣頭病倒了

接踵而來的復古主義的大帽子又扣在梁先生

的頭上。儘管他爲保護中國古建築文化竭盡全力，奮不顧身，終久抵擋不住，病倒了。而陳先生比他還不幸，一九五七年被帶上「右派」的帽子，梁先生還安慰他說：「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對祖國一定要忠誠，要爲祖國服務，但在學術上要有自己的信念。」梁先生正是憑着這種自我的信念頑強的生活。多少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是以類似的信念去自找安慰嗎？

洋溢雋永靈氣之美

新中國的誕生，林徽因女士精神受到極大的鼓舞，在她生命最後的短短幾年裏，完全靠着這股精神力量來支持。她對待任何人，一視同仁，無論學生、青年助教或摯友，非常熱情，有求必應，有時超過要求，主動講解，借給參考書籍。每次談話總是刹不住車，常常激動得面紅耳赤，倒在沙發上。有人說她是有十分力氣而要使出十三分來的人，或者說她是一百三十燭光。她爲她所熱愛的每一項事業——建築、工藝美術、文學，無不傾注了全部心血，她的銘言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她思想非常敏銳，見解卓越，分析事物透徹，凡是與林先生接觸過的人都有同感。

她學識淵博，具有深遠的理論造詣，在她所留下的爲數不多的文學評論、詩歌、序、書信、調查報告等篇章中，字裏行間無不洋溢着雋永、清新、賦予靈氣的美。如《詩笑》中：

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

讓不知鳥雀來盤旋

是誰笑成這萬千風鈴的轉動

從每層琉璃的檐邊搖上雲天

每讀到她爲梁思成著《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序，總是以一種敬仰的心情像讀一篇文學作品一樣去品味這篇結構嚴謹充滿藝術性的佳作。

不幸，她離去這個世界太匆匆了。這位出身書香門第，天資稟賦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災多難的歲月裏，一輩子病魔纏身，戰爭期間顛沛流離，一九四九年以後滿懷激情想爲祖國多作點工作，却憂憂然離去了人間，怎能不令人心痛。

她所留下的著作與她從事各項事業所付出的心血，實在太不相稱，她付給別人的太多太多了，自己從不計較得失；她一生花了不少時間去當啦啦隊，鼓勵旁人寫；另一方面，協助他人工作幾乎耗盡了她的心血。留下的不是豐碩的作品，而是她那真誠、高尚的品質和不朽的精神。應該說她對祖國的貢獻是很大的。營造學社的成就、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成就、梁思成先生的成就等都有她一份功勞。

老年心裏流下了淚

一九五五年四月林徽因女士去世，給梁先生

精神上的悲痛是難以承受的。幾十年來患難與共

，每當他回到家裏，感到惘然若失。同年，因反浪費，民族形式的大屋頂建築作爲浪費的典型受到批判，倡導民族形式的梁先生不公正的被戴上「復古主義」的帽子。精神上受到雙重打擊，他不得不保持沉默。

梁先生從不表露內心的苦悶，他把精力轉向

古建築研究和培養人才教育上。他給年輕教師開工藝品「小豬」，叫大家鑒賞，並說：「你什麼時候體會這只小豬的美，你們也就『悟道』了。」

「每次講課總是旁徵博引、妙趣橫生。他常引用《紅樓夢》中兩個小和尚參禪悟道的故事，激勵

人學建築必須要悟出一番道理，達到妙境，要學習那個小和尚的思想境界：「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一語雙關。一九五七年以後，「超脫塵埃」，已經是知識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梁先生家裏還有一幅梁公的對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這正是梁先生自己治學、爲人的準則，常以此告誡青年學子。

他治學嚴謹，備課認真，以身作則，對青年助教關懷備至，要求講課前一定試講，每次先生總是認真傾聽，對講授的內容以至語調，都一一指教，每一位青年人都樂於向先生求教。

每次由外地歸來，總要向大家談談心得，那怕一點收穫，也不願據爲已有。記得有一次去東北考察，回校後便說：「這次我坐在火車上，路過唐山一帶，見到我平生看到的一棟最美的建築」，在座的人都以爲是一棟非常了不起的大建築，等待下文；他接着說：「這是一棟毛石砌的小廁所，造型美極了。」他說得非常認真，不是在開玩笑，當時大家都笑了。笑過以後，想想，一位建築學者應當隨處觀察，眼睛要尖，要善於學

習。

一九五七年以後，外事活動多，在學校的時間也少了，與大家見面的次數更少了，難得聽到他那開朗風趣的笑聲。明顯表露出内心已受到創傷，在心裏流下了淚。他終於病倒了，住進了北京醫院。病後回到清華園，雖然住進了新建的教授小樓養病，住宅雖然寬敞，夫人已去世，人去樓空，惆悵、孤獨、寂寞，名譽、地位並不能治癒他內心的創傷，人到老年需要的是安撫，要找一位貼心人來陪伴，來管家。

第二春喜獲美嬌娘

曾經有一位中年婦女，還是人民代表，毛遂自薦地向梁先生求婚，寄來自己的照片。並沒有打動他的心。一個六十歲出頭的人並不是不想女伴，他需要如意的伴侶，實際上這時他的心早已被一位女子牽住了。他們的結合，並非偶然一見鍾情，而是情感長期的沉澱所致。他們之間的學識、生活經歷、年齡差異很大，年齡相差是二比一，社會輿論的壓力很大，梁先生的女兒還當面斥責女方。但他們終於結婚了。他的第二個夫人林珠說：「感謝上蒼為我安排了這麼個角色。」

一九四八年林珠高中畢業，她的男朋友程應銓準備來清華大學建築系任教，林珠帶着她父親寫給林徽因的介紹信，一同北上來京，拜訪梁思成夫婦。想請他們幫忙清華先修班學習。一向好客的林先生，報以熱情的歡迎，聽到林珠英語差，主動提出給林珠補習英語，每週三到五次。自林珠來京後，已成為梁家的常客。林徽因先生是

位熱心人，林珠和程應銓的婚事都是由她主持辦的。婚後，他們之間的感情很融洽。林珠沒有上大學，被介紹到清華大學建築系資料室工作。這一對年輕夫婦，生了一兒一女，過着美滿的生活。

一九五七年不幸的事發生了。心直嘴快的程應銓被劃「右派」，林珠終因受不了當時政治氣氛的壓力，帶着一兒一女，與程應銓離婚了。成了一個獨身者。

一九六二年，林徽因去世已七個年頭，生活上愈來愈感到孤獨的梁思成，主動地找林珠幫助他整理資料、料理一些家庭事務，他們有機會單獨在一起傾吐衷腸，感情上一步步升華。雖然學識和年齡差別都很大，社會的壓力也不小，他們衝破了世俗的偏見，終於結合了。

林珠雖遠不如林徽因那樣聰慧健談、才華出众，她倒是一位寡言溫柔，體貼丈夫的好妻子。

自從她搬進梁家，這位忙於外事的社會名流，生活上已無後顧之憂，溫情脈脈的妻子給予他無微不至的照顧，這位年過六旬的老知識份子至少在精神上求得一個短時間的平靜。他很愛這位年輕的夫人，他帶她參加各種宴會，向社會名流介紹他心愛的夫人。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的國慶節的宴會上，梁思成特意向周恩來介紹這位夫人。對林珠說來，這是一次不尋常的社交，她感到滿意。

友費正清夫婦為他做了這件好事，特邀請梁思成夫人林珠訪美，祝賀《圖象中國建築史》英文版的問世。彌補這一損失。

四大罪狀說可悲話

一九六六年夏，史無前例，對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破壞最大的「文革」開始了。批判的對象是所謂「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清華大學建築系是「封、資、修」的典型，是清華園內的「舊文化部」。梁思成是建築系的創始人，是推崇「封、資、修」的祖師爺，批判的矛頭直指這位「留過洋、考過古、當過官的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儘管這時梁思成健康惡化，他總結反右時的經驗，要適應這個社會，就得跟上形勢，千萬不能逆潮流而動。

他拖着病體，如饑似渴地讀着「首長講話」、「揭發材料」、「革命組織」印發的傳單。拼命想跟上「革命羣衆」的步伐。在清華大學建築系門口的牆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喪失民族立場的反共老手梁思成」。其中列出四大問題：「一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接待法國建築師代表團時，在女團長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喪失民族尊嚴』；二是曾出任聯合國大廈的設計顧問；三是擔任過國民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四是反對毛澤東主席的城市建設的指示。」

這些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在當時看來，凡是涉及到「美國」、「國民黨」的事，都應當與「反動」劃等號；凡是違背毛澤東指示的都是「文革」以後，梁思成雖然去世，而他的美國朋

大逆不道。儘管梁思成在家裏有一塊自由的綠洲，但外在的政治壓力太大了，已感覺到隻身難於承受，他在筆記本上寫下：「在思想上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飛躍前進，我實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這位意志堅強的老知識份子吐出難以言喻的內心隱痛。也許這正是一代知識份子的命運。

一九五五年「反浪費」的運動中，把「大屋頂」拿出來作為批判的典型。梁思成因倡導民族形式，批判他推崇「大屋頂」，浪費建設資金，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節約精神，是復古主義的代表。他自己並沒有服氣，他先後在《建築學報》上發表文章，闡述自己對建築創作的觀點：「建築是社會科學、技術科學與美學的結合……」

「文革」期間「紅衛兵」批判他「一九六一年再次向共產黨反撲，搞資本主義復辟。他看了這些大字報說：「如果說學術上的自由爭論是『反黨』的同義詞，提倡民族風格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同義詞，那麼我只好承認自己是『反黨』的，是『搞資本主義』的。我想，我所唯一可以奉獻給祖國的只有我的知識，所以我毫無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識獻給新中國未來的主人，我的學生。我很苦惱，我常想：如果再讓我從頭學習一遍，建築，也許還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難道真的要帶着花崗石的腦袋去見上帝！我後悔學了建築這一行，如果學的是機械、無線電就好了。」

一位治學嚴謹，搞了一輩子建築學的學者，在人生最後的時刻，說出這樣可悲的話，怎不發人省呢？

走的是條倒退之路

「文革」開始不久，他的工資停發，存款被沒收。五口之家僅僅靠林珠微薄的六十元工資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而精神上還要承受「紅衛兵」的「揪鬥」，「噴氣式」往往達三四小時。每次批鬥都要胸前掛上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着「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有時還強迫穿上清代的龍袍、戴上高帽子，在校園內游鬥。他彎着腰，踉蹌地向前移步，幾乎跌倒。他的人格受到極大的屈辱。一九六六年八月開始「破四舊」運動，他的家沒有逃脫被抄的命運。一羣「紅衛兵」闖進家門，沒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指着西餐具中的三十六把小刀，聲色俱厲的問梁思成收藏這麼多刀子幹什麼？

「肯定是要暴動！」這些「紅衛兵」三番五次地來抄查四舊，拿走他們認為「有問題」的東西。把他的設計圖和手稿扯得亂七八糟，還踏上很多腳印。梁思成痛心地把這些圖抱到院子裏，揮灑着淚水，點燃了這一堆「四舊」。在清華園的另一個小院裏，一些「紅衛兵」正在向一堆熊熊烈火中投進他們從四方八面抄來的「四舊」，凡是與「古」字有關的東西都化為灰燼。

一九六七年，他們一家被迫搬到清華北院一間舊平房，只有二十四平方米，陰暗潮濕，嚴寒天氣，室內生了爐子，室內溫度還是處在攝氏零下七度。梁思成先生的身體再也抵擋不住了，病情急劇惡化，住進了醫院。他渴望朋友和學

生來與他談談心事，他孤獨地失望，清華園的知識份子大部分被趕到江西鯉魚洲勞動改造去了。他的等待落空了，他仍是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梁思成先生在他最後的十年生活中，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社會活動中，想按照他所信賴的「導師」所指引的方向拼命向前，正如他在六十年代初所寫的一首詩：

登山一馬當先，豈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後，所以拼命向前。

不幸的是他所走的竟是一條歷史倒退的路。

他沒有看清，這條路是永遠不可能前進的。這不僅是一個老知識份子的不幸，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劇。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這位奮鬥一生的老學者梁思成先生，終於走完了他艱難坎坷的人生。而留給他學生們的是無限的懷念和感嘆！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賁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賢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